

新闻研究资料

XINWEN YANJIU ZILIAO

-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试论舆论优化律
- 观众来信与媒介崇拜
- 论大众传播与宗教变迁
- 香港初期报业研究

GT219-2

88220

1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59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DJ32/26



2001780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京)新登字030号

主 编 孙旭培
副主编 阎焯书
责任编辑 孙五三 李斯頔

新 闻 研 究 资 料

(总第59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80,000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04-1235-5/G·33 定价：2.50元

目 录

- 用党性原则指导新闻学研究汪文凤 (1)
- 理论探讨
- 试论舆论优化律项德生 (7)
- 新闻与意识形态的真实关系何在
- 论“新闻属于意识形态”之失误及新闻应属于社会意识威海龙 (21)
- 观众来信与媒介崇拜
- 《渴望》剧观众来信的内容分析
-孙五三 (32)
- 发展农村广播不必强求一律孔吾德 陈崇山 (53)
-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
- 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思考弹秀玲 (60)
- 论大众传播与宗教变迁曾传辉 (66)
-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为宗教的传播陈力丹 (81)
- 宗教传播的过去与现在黄夏年 (90)
- 日本新宗教的传播张大拓 (99)
- 中国新闻史
-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方汉奇 (110)
- 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赵玉明 (126)
- 江西省“文化大革命”派报略述龚小京 (138)

- 五四时期《时报》的副刊改革姚福申 (146)
旧上海通讯社的发展马光仁 (155)
从严复的《说难》看《国闻报》历经的坎坷
.....陈曼娜 杨培基 (168)

· 研究方法论

- 论问卷的适切性闻 天 (176)
抽样误差不超过 3%就够精确了吗?
.....柯惠新 (187)

· 国外及港台新闻界

- 日本新闻传播领域的新技术应用与发展宁 新 (190)
香港初期报业研究谢 骏 (201)

· 考证补遗

- 张季鸾参加过同盟会吗?曹世瑛 (214)

· 补 白

- 报纸版式新风格: 无中缝排版(31) 国家版权局简介(59)
《中国电视报·外语节目版》创刊(65) 《体育文摘周报》创
刊(80) 英国广播公司开办跨大西洋广播(89) 拍卖合众国
际社(145) 《东方日报》发行量居香港报界首位(218)
新闻出版保密规定 (219)

用党性原则指导新闻学研究*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和新闻科学研究，要贯彻党性原则。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这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新闻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够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个总方针、总任务，新闻出版工作、新闻科学研究工作，都是为贯彻执行基本路线服务的。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新闻科学研究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我们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但是，不能够把它们夸大、抬高到超过党的总方针、总任务的地位，甚至说党的路线正确，是由

* 本文为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汪文风同志于1992年2月31日在新闻所召开的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汪文风同志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北京《光明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此次将文稿交由本刊发表，本刊表示感谢。
——编者。

于新闻出版工作、新闻科学研究工作正确；党在路线上出了问题，靠新闻出版工作、新闻科学研究工作就可以纠正。这是错误的。新闻出版工作、新闻科学研究工作中坚持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坚持党性原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尽管有人诋毁工具论，有的人更进而把工具论诋毁为仆役论，我仍然认为工具论是十分正确的。我们的党是干什么的，是无产阶级用来团结自己，团结同盟军，从而去战胜敌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工具。等到将来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制度不存在了，它的各种影响不存在了，各种因袭的负担也彻底消除了，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将消亡。当然，那是长远的将来的事情。然而，党既然也是工具，我们新闻出版、新闻研究作为工具，还有什么不光荣、不可以的呢？如果硬要用“仆役”这个字眼的话，我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人员、新闻科学研究人员，是无产阶级的“仆役”，是人民群众的“仆役”，是适应社会发展的“仆役”，即所谓人民的公仆是也。这比之做资产阶级和反动统治者的仆役，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们的党性原则，是最有远见、大公无私和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对于我们中国的新闻出版、新闻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新闻科学研究人员，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要遵循党性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还要服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警方说，省级报刊，不管你是党报、人民团体办的报、专业性的报纸刊物，都要服从省委和省委宣传部门的领导。记者、编辑、报社负责同志写的稿件或要作什么宣传，除了遵循党性原则以外，过去有些稿件要送审，现在也还存在送给有关的领导人、

知情人看一看的做法。大的报道方针和重要的报道计划，报纸刊物的领导人要在党的委员会或者一定的范围内，共同来讨论决定。这就可能发生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以为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统一意见。我以为这种探讨，并没有什么不好，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更慎重一些，更周全一些。因为记者、编辑、报社领导，你的采访、调查研究再深入，下笔再字斟句酌，仍然可能产生不如专门做那个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了解得全面、准确的问题，人之所长，正好补你之所短。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他在其中，久而不辨其香臭，你却是旁观者清，你是对的，可以以你之所长，补他之所短。问题发生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不能达成统一。这种情况多出现于批评性的报道和言论。我认为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要依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来处理。然而往往出现这类事情：一篇本来是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制止危害党和国家利益的报道或言论，由于某个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同志，或因护短，或因“家丑不可外扬”，或因考虑失度，强行把稿件压下不发，也可能是记者、编辑写的稿还不够周全，发表出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利，把稿件压下不发。在我以为，出现这种不同意见一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探讨来加以解决的，必要时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以求解决。但新闻报道和报刊言论，时间性强，误断有时会造成一定损失。好在现在报刊负责人有个独立对报道言论负责的做法了，这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当然，独立负责，报刊的负责人更应当遵循党性原则，权衡每一篇报道和言论对党、对国家、对人

民事业的利弊得失，从而慎重决定取舍增删，放重放轻，放前放后，配搭得当。我们的新闻科学研究则需根据这些原则来评判是非，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工作发挥指导和引导的作用。

我们历来讲党的报刊的三性：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前几年，有人主张用所谓的人民性来代替党性原则（这个问题我在纪念党诞生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已经谈到了，详见《新闻研究资料》总55辑），发展到极端，导致了1989年动乱、暴乱中错误的舆论导向，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提倡社会主义的民主，也即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搞的那种煽动群众、蛊惑人心、谣言生事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的报纸刊物发表东西，都要以党的基本路线来衡量、斟酌。我很赞成有新闻、旧闻、不闻的主张，要唾弃所谓只要是事就可以报道的主张。在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是事都可以报道只是一句空话，一句骗人的话。美国能够那样吗？独联体能够那样吗？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立论的虚伪性。再者，全世界、全中国一天发生那么多事，你都可以报道得了吗？社会主义的报纸刊物要对人民负责任，不管翻开哪一张报纸刊物，甚至某一篇较长的文章中，新闻、旧闻、不闻都是一个客观存在。旧闻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意思，也就变成了新闻；至于不闻，则比比皆是，有的是有意识地不予公布的，有的是你报纸刊物根本不知道的。鲜明性，是社会主义报、刊、广播、电视应有的特色，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切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一切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我们

就是要大力宣传，加强研究，反之，那怕新闻拖成、压成旧闻，还是要拖、还是要压；那怕新闻变成不闻，也不让它出现。新闻注重时效，应当是今天发出的而没有发出去也是错误的，重大的错误要追究稿件卡在哪个环节上，是哪个部门的责任，就追究那个部门的责任。谈到准确性，就要反对克里空。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通讯社、报纸报道我军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战绩，国民党方面“批驳”说没有那么一回事，不两天，我们重庆《新华日报》就指名道姓地登出来了：国民党某师某军某个集团军的某某长官、副长官，现在我某个解放区，家属亲友有信件物品交他，我们可以代转。这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要是闹克里空，那还行吗！新闻报道不能有差错，有了差错，骗了别人，也骗自己。西蒙诺夫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名记者，他有一篇文章谈到他去访问一个模范人物，他采访和观察得很认真。到写稿时，他想起对方的头发是什么样了，就想当然地写了“满头金发”。当他再一次碰到那位采访对象时，对方摘下帽子，说：“你看，我有头发吗？哪来的满头金发呢！”你看，不准确，闹了一个大笑话。当然，刘宾雁是主张写新闻通讯也可以合理想象的。刘宾雁后来到了国外反党反社会主义祖国去了，但是不能说过去他有的这个主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祖国的，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不过，我不同意他这个把新闻、通讯、特写与艺术作品不加区别的主张。至于生动性，这包含了新闻、通讯、特写、副刊、专刊文章本身写得是否生动的问题，也包含了报纸、刊物所发大小言论是否生动的问题，还包含了组版、标题、时间配搭、前后联系是否生动的问题，还包含了文字与图片、漫画、插图相配是否生动的问题，等等。甚

至也包含了纸张、油墨、色彩等问题。我就看见过同样内容的新闻、通讯、文章在甲报上很不起眼，老态龙钟，在乙报上却变得生动活泼，颇引人看。这里面的奥秘是否需要研究研究？要说我们的党报党刊都不生动活泼，我看不是事实。过去在国民党陪都的重庆，几十种、上百种的报纸刊物，我们的《新华日报》就是生动活泼，受到群众的欢迎。当然这里有统一战线的大功，但作为宣传工具来说，《新华日报》总是作为主体的。那么，在建国后有一段时间，譬如1958年的一段时间，“文革”时期的那段时间，的确存在看报看题、看书看皮的情况，报刊也千篇一律，不能吸引读者。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一、党的路线上出了问题，不能全由报刊本身负责；二、千篇一律，中央不同对象的报纸也没有自己的特色，各省、市、自治区和市、区、县的报纸也没有自己的特色；三、由于不正确的压制，大家都追求共性，不敢办出个性，办出特色。还可以举出许多，就要请你们专家去研究了。当前，我们倒是要注意我们的报刊反映会议新闻、领导机关的指示、领导人的活动过多，而反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不足的问题。

我之所以说了上面这些，目的在于激发起同志们们的热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学研究所，主要的任务是加强新闻学科的研究，不管中国的、外国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都要进行研究，吸取人类社会有新闻以来的一切有益的成果，去掉糟粕，取其精华，以为我们办好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之需、之用。

试论舆论优化律

舆论优化指的是舆论活动的趋向和所达到的境界既符合民意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既令舆论主体满意又对历史发展起进步作用。与此相反，则是舆论的退化和劣化。优化是舆论质量的上升，退化是舆论品位的下跌。

舆论活动作为一种认识过程，它同人类认识的总进程一样，是历经曲折，逐步向绝对真理靠近的。错误的舆论，片面的舆论，通过实践的检验，历史的印证，会被矫正或纠正。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舆论优化律，重点不是讲舆论的自然进化，而是着重通过舆论控制使之趋向优化状态。当然，舆论优化不是追求最优化、最佳化，在充满偶然性的舆论活动中，任何强有力的控制所能实现的期望值，对舆论主体和决策者来说也只能是一定的满意程度。

实现舆论优化，需要遵循如下几项原则：

1. 活力性原则

舆论活动是一项亿万群众参与的社会活动，应当始终保持相当活跃的气氛。没有活跃的气氛，便没有舆论的生成和优化，而活跃的气氛则来源于社会的活力和舆论主体的活力。

主体的活力，主要表现为主动参与、思想活跃、敢于发

表独立见解、敢于驳斥对立意见，以及不同意见之间能展开自由争论、相互商榷、彼此撞击、互动互补。舆论主体的活力是舆论优化的内在动力。舆论合力有多大，舆论质量有多高，舆论评价向真善美趋近到何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活力的大小。如果主体的意识处于麻木状态，消极避世，就没有众多人对世事的关心，也就没有舆论活动的热烈气氛。如果主体思维处于封闭状态，僵化老化，不敢提出新问题，不敢发表新见解，舆论就失去活力而难以优化了。

具有舆论活力的主体，应当具备如下几方面的素质：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只有这样才会踊跃投入到参政议政的活动中去，才能热切关心和随时评论社会事态。二是敢创天下先，对众说纷纭的问题能够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只有具备这样的思维品格，才能促使舆论趋近真理和时代精神。三是正视现实，服从真理，勇于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纠正自己认识上的片面性，对正确意见自觉趋近。

主体活力在众多的舆论参与者之中不是均匀等量的。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最具舆论活力的是一批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先进阶级的知识分子。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率先大造维新变法舆论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维新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力宣传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彻底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启蒙者，都是先进舆论的倡导者，开创历史新阶段的先行者。正是他们以自己的活力激发公众的活力，才使革命舆论终成燎原之势，达成社会舆论的大面积的优化，促成革命大业的振兴。所以，在国外这种先

行者被誉为盗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之神，在中国被称为播撒革命火种的人（简称“播火者”）。没有这些“盗火者”和“播火者”，就没有社会舆论的迅速革命化和科学化。

就整个社会而言，活力性原则就是社会舆论的民主原则。舆论的民主原则，一是让人民知情，二是让人民说话。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16页）这样就能使党内生活充满活力，使党内舆论和社会舆论充满活力。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如果抛弃了舆论的民主原则，不允许不同意见之间的并存和竞争，就会造成一种窒息活力的政治环境，整个社会可能会被僵化的教条所笼罩，从而阻碍社会舆论向真善美趋近。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133页）我们党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发扬民主，拨乱反正，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使党员和群众的思维活力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发扬民主、充满活力的社会，崇尚思想解放，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活跃持鼓励的态度，采取保护的措施。一个国家，只有反对思想禁锢，保证公民畅所欲言、敢想敢说的权利，

才能焕发每一舆论主体的政治积极性和思维活力。为此，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提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135—134页）改革开放的十余年间，正是在党和政府的鼓励下，广大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时期，是社会舆论活力最旺盛、总体水平最高的历史时期。在这十余年间，中国人民做出了难以计数的创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向前推进，正是得力于社会的活力，舆论的活跃。

为了增强舆论的活力，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仍然有必要在党内进行民主意识的教育。民主意识最主要的是全体党员在人格上、政治上一律平等的意识，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又保护少数人的意见的意识，以及积极参与管理党内和社会事务的意识。提高党内的民主意识，从根本上是鼓励和保护全体党员参与党内重大事务的决定与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负责精神。要求每一个党员主动了解党内事务，积极参与党内重大事务的讨论，积极对党内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敢于对党员干部和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同党内一切腐败现象进行斗争。贯彻这种精神，党内生活必然正常，党内舆论必然活跃，即便发生工作上的一时失误和腐败现象，也能在健康舆论的监督下及时加以纠正和清除。同样，在社会上，对

全体公民也应进行这样的民主意识的教育，为社会舆论的活跃与健康提供可靠保证。进行民主意识的教育，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比如，在提拔干部和推举先进时，常常以“听话”与否作为重要标准，总喜欢提拔那些顺着领导说话的人；而对那些有独立见解，敢于对上级进行监督，敢于认真负责地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同志，往往不大喜欢，不大放心，这就是民主意识淡薄的典型表现。不转变这种观念，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会缺乏生气和活力，人们对重大问题不善于进行独立思考，不敢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甚至造成麻木迟钝、一片沉寂的可怕局面。在这种环境里，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舆论，因为不具备舆论优化的起码条件。

坚持活力性原则，是舆论优化的客观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保证舆论活跃和舆论优化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19页）按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正确的意见，做到“五个统一”，那就会获得正确的巨大的舆论合力，实现党内舆论和社会舆论的高层优化。

2. 求真性原则

活跃起来的舆论的第一目标追求，是舆论主体对事态真

相的知晓，对事变因果的探究。舆论优化是群众认识向真理靠近的过程。某一舆论的优化程度，取决于它所内含的真知实情的充分与可靠的程度。

舆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种认识活动，认清事物——评价对象的状态和性质，是它首要而急切的追求。获得了真情实况，舆论活动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和深化。一旦真相不明，或者会引发舆论的焦躁骚动，或者会引发许多猜疑谣传，或者迫使舆论评价暂时中断。这些都有碍于舆论的优化。舆论活动一旦启动，那些活力极强的舆论骨干分子，常常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顽强精神，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他们绝不罢休。例如，1988年轰动日本列岛的里库路德案件，正是由于记者获取蛛丝马迹之后，穷追不舍，从而让事件真相曝光于日本国民和世界舆论面前的。愤世嫉俗的千百万日本国民怒不可遏，舆论大潮把执政的自民党逼到无计可施的地步，短短两个月内连换两届内阁。这里且不论西方记者的出发点如何，也不论他们的活动有什么政治背景，他们的这些努力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舆论优化的客观要求，对优化舆论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舆论的求真精神表现得更为主动、强烈、健康和执着。这种追求逐渐摆脱了低级趣味的干扰，主要倾注于对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的关切。人民群众抱着对历史、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评议一个个严肃的问题，同时探知一个个未知的领域。如“三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什么地位？它们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多大效益？什么叫股票和股份制企业？在我国怎样依法进行股票交